

1949 ~ 1952 年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高冬梅

【摘要】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被国家和社会纳入救助范围的社会群体。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灾民、失业者、妓女、乞丐和孤老病残等,其存在原因首要的是自然地理因素,其次是社会转型因素与历史遗留问题。弱势群体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初始选择。

【关键词】1949~1952年 弱势群体 灾民 失业者

【中图分类号】K27;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5-0058-08

弱势群体社会救助是事关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大事,纵观以往对中国社会救助的研究,对国家和社会的救助政策、措施关注较多,而对救助对象——弱势群体却鲜有专门论述。事实上,社会救助成功与否,对弱势群体的透彻了解甚为重要,因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也就成为深入了解社会救助的一把钥匙和客观评价社会救助政策及其绩效的基础。本文拟对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加以探讨,以期推动新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被国家和社会纳入救助范围的社会群体。按照这一定义,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灾民、失业者、妓女、乞丐和孤老病残等。本文主要以灾民与失业者为例,分析当时中国的弱势群体问题。

一、弱势群体的成因与状况

(一) 自然灾害与灾民的生存困境

中国是个灾荒频发的国家,素有“无灾不成家”之说。1949~1952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详见表1)说明,当时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各种自然灾害之间伴生性、群发性明显。

关于当时的灾害情况,我们通过农作物的受灾、成灾面积可见一斑(详见表2),当时我国每年都有大片国土笼罩在自然灾害的阴霾之下。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抵御灾害的能力十分薄弱,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严重。首先是人口大量死亡。根据民政部的统计,

【收稿日期】2010-01-24

【作者简介】高冬梅,法学博士,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50091。

* 本文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2008B06)的阶段性成果。

表1 1949~1952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情况

年份 \ 灾情	水灾	旱灾	蝗灾	雹灾	风灾	霜冻	地震	瘟疫
1949	特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严重			一般
1950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1	一般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2	一般	严重			严重		严重	

注：表中所用“一般”、“严重”、“特大”等灾害程度的评判标准是参照同类研究成果得出的，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相关文章。

资料来源：根据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等编《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自然灾害案例（1949~2004）》等档案资料和《人民日报》等报刊资料整理。

表2 1949~1952年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 单位：万亩

年份	受灾面积	其中			
		水灾	旱灾	风雹	霜冻
1949	14018	13923	78		71
1950	15571	9838	3597	1215	921
1951	21360	6260	11744	839	2517
1952	13553	4191	6354	1587	1421

资料来源：孟昭华、彭传荣著《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仅1950年水灾就死亡22368人^①。其次是对灾区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破坏。自然灾害除了直接夺取人的生命外，还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的作用破坏人类生态系统，如交通通讯设施、农田等。据不完全统计^②，1949年倒塌房屋264万间，减产粮食114亿斤，耕畜损失2.6万多头，灾区工矿企业、交通邮电通讯、水利电力、文教卫生等设施 and 财产也遭受了不同程度损失；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缺失使灾民生活濒临危机，1949~1952年我国受灾人口分别达到4555万人、3384万人、3034万人、2760万人。灾民生活极其艰难，甚至于妻离子散、颠沛流离。

（二）失业现象和失业者的生活问题

1949~1952年，我国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其表现是：失业人数多，城镇失业人员分别达到474.2万人、437.6万人、400.6万人和376.6万人；^[1]失业类型复杂，周期性、摩擦性、结构性、季节性失业都存在；失业群体广泛，既有工人，又有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失学青年、家庭妇女、小商小贩、旧军官、旧官吏等；失业者生活窘迫。如此严重的失业现象与当时社会处于急剧变迁的历史时期是分不开的。首先，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解放前夕全国仅城市失业者已达470万人^[2]；其次，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企业被取缔或勒令歇业、转业，一批新的失业人群随之出现；^[3]“五反”运动后期，劳资关系紧张，生产萧条，失业剧增，从“五反”开始到1952年6月，新增失业人数150万

①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等编《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自然灾害案例（1949~2004）》，第5~13页。

② 参见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等编《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自然灾害案例（1949~2004）》，第2、5、6、13、19页；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6~28、45~47、62~65页。

人。^[4]此外,失业问题严重也与城市化速度加快等因素有关。

除了灾民、失业者以外,当时的弱势群体还有妓女、乞丐、老弱病残等。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5],旧中国娼业“畸形繁荣”^[6],乞丐散布在街头巷尾。由于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7],乞丐“无论如何复杂,……其本原总是因贫困无着求衣食之计的一条穷路子”^[8],旧中国遗留的娼妓、乞丐被纳入新政权的救助范围。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游民、乞丐大约有24万人,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弱残疾者至少有11万人。^[10]

由上可见,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的出现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其中首要的是自然因素,其次是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所致。

二、弱势群体的特征

1949~1952年的中国弱势群体是一个松散的、缺乏组织性的人群聚合体,相对于当时其他群体和其他时期的弱势群体而言,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或共同类别特征。

(一) 经济上的极度贫困性

尽管当时中国民众普遍贫困,但与其他群体相比,灾民和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因自然或社会因素陷入了更为贫困甚至无以为生的状态。

以灾民为例,1950年6月,河北省密云县“七万三千多人长期以野菜树叶为主食,许多人丧失劳动力或仅能轻微劳动,三千七百多人因长期吃不到粮食和盐而面色苍白,身体肿胖、性命危殆……”。^[10]为了充饥活命,许多灾民被迫变卖家产甚至妻儿。1951年5月,据对广东省2个市7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处于饥饿中或濒于饥饿线上的就有2755237人”,“仅阳江县即有16人迫妻改嫁,12人抛卖儿女”,不少灾民无奈之下外出逃荒。^①据统计,1949年受灾地区逃荒人口达到200万人之多^[11]。逃荒者成为背井离乡、饥馁交迫的流民。

又如失业者,一般而言,在城镇中失业就意味着断绝了基本的生存来源,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劳苦大众缺乏积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时的许多文献记录了失业者生活的窘迫,1950年张家口市592个失业工人中:“一天吃一顿莜面或小米饭的占百分之六十,吃黑面干粮稀饭的占百分之三十,完全喝稀粥的占百分之八,吃菜粥豆腐渣的占百分之二”^[12];1952年河北省通镇1600名失业工人中,“生活困难而无隔宿之粮的占110名,将家具卖光的18名,既有病又有困难的11名”。^[13]乞丐和妓女也是因为无以为生而流浪街头或堕入娼门的,因此当时中国弱势群体在生活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极度贫困。

(二) 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脆弱性

周晓虹认为,“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变对人类心理生活的强烈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张皇失措,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麻痹与震颤”。^[14]由于生活无着,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受挫情绪。

1950年8月,皖北灾区“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痛哭,干部亦垂头流泪”^[15];又如1950年河北雄县受灾后,灾民“叫苦连天,大多数的村干群众准备逃荒”。^[16]悲观绝望之下不满随之

^①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生产救灾工作初步综合报告》,1951年6月13日。

而生, 1951 年河北省阜平、曲阳两县灾民面对灾后“生活极为困难”的局面, 产生了怨言。^[17] 失业工人也是如此, 1950 年中央有关文件称, “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 无以为生造成的巨大压力甚至使人产生对个体生存意义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 失业者“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18]

(三) 利益上的趋同性和聚合性

各类弱势群体虽然遭遇不同, 但处境相同或相近, 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导致“群众性骚动事件”发生, 从而引发社会动荡。1950 年华东“六合县南圩、五子二新区六个乡……二千余群众, 以‘穷人买吃不买烧, 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 到仪征县胥浦区大安、安墩二乡投山破树, 与当地群众发生械斗, 互伤十余政工干部”, “扬州市……连续发生灾民抢米店事件十余次, 少则二十余人, 多的有二百余人”, “怀远县……梅桥、鲍集、新马桥等三个区九个乡八千余人抢劫公粮六十余万斤”。^[19]

又如失业工人, 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 中南区“不止一次有工会会员退会、拒交会费、包围工会、殴打干部的现象。长沙等地还发生过失业工人骚动的严重事件”^[20]。1950 年 5 月, 南京市 35 万名无业、失业者及难民使“街头乞丐、小偷(以前已收容千余人)骤增。盗窃破坏(非政治性的)事件防不胜防, 弃婴、溺婴、卖儿女者亦随之发生。在市民中传达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时, 时常遭哄骂。庆祝解放一周年时, 街头学生宣传队被群众包围要饭吃。有恒面粉厂被群众抢去面粉一卡车。至于近郊农民作物被抢、街头抢饭吃等等事件更属常见”。^{[20](pp. 119-120)}

(四) 群体结构的复杂性

1949 ~ 1952 年中国弱势群体数量庞大。如前所述, 灾民、城镇失业人员、游民和乞丐以及生理性弱势群体的人数至少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12%。救助对象的数目如此之大, 在近现代史上也属罕见。这一庞大的群体, 从产生的原因看, 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有社会、经济原因, 也有生理原因; 从涉及的社会阶层来说, 既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又有妓女、乞丐; 从行业范围看, 弱势群体几乎存在于工商、交通运输、建筑、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 从地区范围来说, 覆盖了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全国各地, 情况颇为复杂。

(五) 群体爆发的集中性、阶段性

1949 ~ 1952 年的新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 失业、乞丐等旧的社会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 社会重建中的新问题如经济结构改组造成的失业等又出现了, 新旧问题叠加, 使得弱势群体问题呈现出集中性。集中性中又体现出阶段性, 即弱势群体的集中出现总是以大的自然灾害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台等为背景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如自然性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与 1949 年、1952 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相伴随, 失业问题也与 1949 ~ 1950 年、1951 ~ 1952 年国家调整旧的经济结构、稳定物价、“五反”等治理整顿政策的实施相一致, 曾出现 1950 年、1952 年两次高峰。

总之, 相对于当时其他群体而言, 1949 ~ 1952 年中国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贫困性、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脆弱性以及利益上的趋同性、聚合性等特点。贫困性是弱势群体的本质特征, 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脆弱性以及利益上的趋同性、聚合性是其外在表现, 而这些都是其弱者地位的集中体现。相对于其他时期的弱势群体而言, 1949 ~ 1952 年中国弱势群体又有群体结构的复杂性和群体爆发的集中性、阶段性等特点, 这又说明了社会变迁与社会政策对弱势群体问题的巨大影响。

三、弱势群体问题对新中国建设的影响

自古以来,弱势群体问题就是社会风险的渊藪,因此研究灾荒史的邓云特如此总结灾民与政局、社会秩序的关系:“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大小,或时间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21]荒年意味着大量自然性弱势群体——灾民的产生,灾民起义则严重威胁社会与政局稳定,可见弱势群体问题对社会秩序和政权巩固的影响。

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同样也影响着处于变迁与重建中的新中国。

(一) 是影响安邦治国的因素之一

当弱势群体将自己不如意的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所以,如果无视弱势群体的存在,极易发生社会动荡。如“在1949年底1950年初,对上海社会治安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和游民乞丐”,“突击收容了哈尔滨大楼的游民以后,至少使沪北地区内的治安案件减少了百分之四十”。^[22]由于当时是一个承前启后、破旧立新的历史时期,敌对势力乘机“在灾区,……抓住群众生活困难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空隙,煽惑群众‘请愿’、‘要求救济’、‘抢粮抢饭’”^[23],并且制造谣言,阴谋暴乱,企图转移农民斗争目标;在城市,则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不满情绪,“造谣煽惑,企图挑拨工人群众来反对我们,在个别地方已有部分工人受其欺骗煽惑反对工会,殴打我们干部的事实”^[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妥善救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不能维护社会稳定,新的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建设更无从谈起。据钱正英回忆:“当时中央要治理淮河的时候,我们听到传达,说毛主席数了中国的历史,讲到淮河流域这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地方……为什么农民会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穷,灾难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之下,农民就要起来搞起义。”^[24]这说明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弱势群体问题的严重性是有清醒认识的。

(二) 成为检验中共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标准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营企业的工人,在考虑工资或复工问题;私营工厂的工人和商店店员,则担心失业或酝酿要求改善……大批失业知识分子则关心我们能否给以出路;三轮车夫因为现在坐车的人既减少,又恢复了电车,在纷纷问我们该怎样办?贫民则焦急地等待着,看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新办法,等待着新的福音”^[25]。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最能体现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弱势群体问题解决得好坏成为检验中共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标准之一。

(三) 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影响

弱势群体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乞丐认为“共产党来了,乞丐也该大翻身了”,“自称为无产阶级,横行市面”,扰乱了经济秩序。^{[25](pp.381-382)}大量存在的弱势群体和闲置的劳动力也影响了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与后劲。当时我国科技水平很低,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宝贵资源,而战争还在进行,一部分精壮劳力忙于战争,所以弱势群体中闲置的大量劳动力是严重制约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因素。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认为“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是“使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就没有获得”^[26]的因素之一。灾民问题也被政府认为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27]。

(四) 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乞丐、妓女等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则使其受到干扰。乞丐特别是职业乞丐坐吃等穿、寄生社会的“越轨生存方式”和流氓无赖作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但她们也是危害国民健康、社会风气的主要渊藪。上海同济医院 1946 ~ 1950 年检查的 2448 个孕妇中,平均“每 16 位孕妇中就有一位患梅毒的。这些孕妇大多是家庭妇女,她们的性病多数是通过丈夫间接传染,或是由上一代遗传所致”^[28],由此可见卖淫嫖娼行为的泛滥。

四、弱势群体问题与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确立

鉴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特征与影响,代表人民利益、刚刚依靠人民力量夺取政权的中共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1950 年夏,淮河发生水灾,当毛泽东看到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 1931 年最高洪水水位的汇报后,当即批示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29]8 月 5 日,毛泽东在看到中共皖北区报告灾情及救灾工作的电报后落了泪,责成周恩来“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29](p.456)}毛泽东在当时战争还在进行、百废待兴、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对淮河水灾做出根治的决策,足见其对灾民问题的重视和根本解决该问题的决心。

由于中央重视,1949 年 12 月到 1950 年 1 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内务部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同时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政务院制定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各大城市,如北平,在和平解放不久的 1949 年 9 月,就制定了《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1949 年 11 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各大城市解放后不久开始收容救助乞丐。这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就初步确立了社会救助制度。

弱势群体的情况也决定了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初始选择——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以“补救物质缺乏”^[30]的积极救助模式。

第一,由于弱势群体数量大、影响大,这就决定了救助工作必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依靠合力尽快完成。《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等救助法规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皆被确定为救助主体,并且确定救灾工作的关键是“灾区党、政、军、民必须都动员起来”^[32]。民政、财政、农业、水利、贸易、卫生、合作、铁道、交通、银行等部门及人民团体等都要派员组成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或办公室,组织系统完备;经常出现的场面是党政军民齐上阵,抢险堵口、护堤,全力以赴与灾害作斗争,四面八方皆提供援助。1949 年河北水灾发生后,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与洪水作斗争;1950 年上半年,为保证灾区人民的粮食需要,“东北入关一百零三万吨,四川运出二十万吨,由于浙赣、粤汉铁路现已通车,其沿途的若干地区……运出的约有三十万吨”。^[31]劳动局、建设局、民政局、卫生工程局、公安局、工会、工商联合会、合作社等相关单位都参加了失业救助。1950 年 4 月,为救助失业工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在业工人进行了节约捐献活动。

第二,弱势群体情况复杂,不同的群体面临不同的困难,这就决定了社会救助必须区别对待、分类救助。当时政府制定了适合不同群体的救助法规,如《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等,针对不同群体安排了不同的救助制度体系,如对灾民坚持“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失业救助以“以工代赈为主,同时采取生产自救、转业训练、帮助回乡生产及发放救济金等办法”^{[27](p.625)};救助妓女要“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25](p.406)}。生理性弱势群体则基本上立足于长时间的救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个别化原则。

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尚未巩固,战争还在进行,经济一穷二白,社会百废待兴,这就决定了此时的社会救助必须是迥异于同时期西方在“福利国家”理念指导下的高标准、没有领取时限的单方面“给予”的救助制度,而是要与当时的生产相结合,采取着眼于改善生存环境以及帮助和提高弱势群体自救能力的积极救助。“我们的救灾工作,全靠加强领导,深入检查,组织灾民,生产自救,精打细算,节约互助,来补救物质缺乏与交通不便的困难”^[30],并确立了通过发展生产来实现救助的制度规则。救灾中生产自救是核心;救助失业也不是单纯的放赈,而是“介绍就业、还乡生产、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业训练占百分之八十六,而单纯救济的仅占百分之十四”^[32];妓女、乞丐救助更是注重培养和增强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建设,以发展促救助。当时的救助不是对所有救助对象不分类别地进行“包养”,而是“救”中有“防”,将“救”纳入整个经济建设中进行综合治理。

第四,对弱势群体要达到即“助困”又“救人”的目的,必须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综合调控。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救助各类群体时既要采取发放急赈、以工代赈、安置就业等经济措施,也要让弱势群体学习文化、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因。如当时救助工作中,妓女要参加“固定的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及娱乐活动”^[32]。乞丐一般每天要有8个半小时的学习和讨论时间。

总之,针对当时的弱势群体问题,党和政府及时确立了社会救助制度;尽管社会救助制度安排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事实证明包括救助主体、规则以及方式等的设定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后来的社会救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我国主要采取以积极救助为准则、依靠社会动员来运作的制度模式。

[参引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8~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 [2] 袁伦渠:《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 [3] 何光:《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 [4] 程连生:《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646页。
- [6] 单光翔:《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 [7] 马维纲:《禁娼禁毒》,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 [8] 曲彦斌:《中国乞丐》,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 [9] 孟昭华、王明寰:《中国民政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 [10]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密云县灾情与措施报告》,河北省档案馆:907-1-61。

- [11]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指示》，北京市档案馆：2-2-58。
- [12] 《张家口市委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报告》，河北省档案馆：758-3-216。
- [13] 通镇人民政府：《关于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设立及救济过程情况的综合报告（1952年5月）》，河北省档案馆：932-3-141。
- [14]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 [15]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 [16] 《雄县救灾材料》，河北省档案馆：931-7-4。
- [17]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 [18] 《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北京市档案馆：196-2-212。
- [19] 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局关于怀远县发生抢粮事件的处理给皖北区党委的指示》，《斗争》1950年第30期。
-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 [2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5页。
- [22] 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1期。
- [23] 《继续与灾害搏斗，保卫秋收！》，《人民日报》1949年9月8日，第1版。
- [24] 转引自高峻《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 [25]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 [2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 [27]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
- [28] 杨洁曾、贺宛南：《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72页。
-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页。
- [30] 董必武：《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 董副总理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3月7日，第2版。
- [31] 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 [32] 《北京妇女教养院的改造妓女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2月9日，第4版。

[责任编辑：郑 璐]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要目

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与经验	朱志敏
新中国初期的政治整合研究：过程、特征与结果	吴晓林
1969~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的苏联因素	栗 广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	杨凤城
“大跃进”期间考古工作述析	刘建美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认识	祝 彦
试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周锦涛
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	何友良
何干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著作的编撰——三本中国革命史教材的比较研究	梁 栋
国外学者关于新中国历史上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析	肖 娴 任晓伟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人闽初期的十九路军	薛宗耀
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	张静如

Vulnerable Groups in China in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52 Gao Dongmei (58)

Abstract: Vulnerable groups generally refer to the social groups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that, due to some barriers and lack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ar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are listed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categories needing social relief. In the years of 1949 to 1952, China's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ed victims of natural calamities, the unemployed, prostitutes, beggars, orphans, the helpless old, the sick, and the disabled people. Reasons for their existence were mainly the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secondarily wer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blems left over by history. The situ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determined to some extent the initial choice of social relief system in New China.

Keywords: the years of 1949 to 1952, vulnerable group, victims of natural calamities, the unemployed peopl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House Properties in the City of Shanghai

..... Zhao Sheng (66)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new democratic housing policy specifically provided clear-cut protection of th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urban private house properties. The protection was changed in 1956 into transformation, which culminated in 1958, and by 1964 the nationwid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vate house properties basically came to an end. Joint state-private ownership and hiring out by the state were the two major forms of transformation. As some of the "Left" approach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were employed, the transformation was overdone and left over some problems.

Keywords: the City of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house properties, joint state-private ownership, hiring out by the state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operated Economy in Hu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9 ~ 1989)

..... Wang Guoyu (74)

Abstract: In the years from 1979 to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from small to big in Hunan Province went through a difficult process: In the early 1980s, the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was concentrated in retail businesses with a small share in the same industry, but growing fast. From 1982 to 1985,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ssu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and accordingly Hunan Province gradually relaxe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scope and ways of ope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resulting in its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From 1986 onw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Hunan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giving rise to a more relaxed and free environment and the first peak of its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in Hunan after the launch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a product of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re and support from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changes in people's mind in Hunan Province from 1979 to 1989 are, to an extent, the epitome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that period.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nan Province, non-state-operated economy, the years from 1979 to 1989

*** Notes on National History ***

Notes on Reading *Chronological Deng Xiaoping's Life (1904 ~ 1974)* Zhang Jincai (82)

Keywords: *Chronological Deng Xiaoping's Life (1904 ~ 1974)*, Notes

The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stablished by China in 1965 Jiang Changqing (86)

Keywords: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special economic zone, 1965

*** Textual Research on National History ***

Li Xiannian and the Principle of "No More Flip-flops" Zhang Shaochun (90)